

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基于对《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考察

林晨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农业是民生之本,立国之纲。1955年底,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完成之际,为了更好地指导农业发展,给亿万农民指明一个奋斗方向,毛泽东统筹考量我国现实国情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领导制定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指导农业发展的专门规划。这一规划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等重大问题的集中思考和实践总结,是党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这一规划的出台与实施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决好“三农”问题并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现代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1-0008-09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毛泽东在 1955 年底主持制定的新中国首个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在 1956 年 1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以草案的形式公布,经过 1957 年 10 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和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两次修正,最终于 1960 年 4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由于《纲要》的诞生与施行受到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往往被视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进而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对这一文本的负面评价,甚至存在一些完全否定《纲要》历史地位等有失偏颇的倾向。虽然《纲要》的制定和施行有着不可否认的时代局限,但它作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首次尝试,凝结着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内涵、方向、原则、路径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为党在之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供了初步指引,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 毛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历史动因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党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依次展开。为了更好地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热情引导到农业生产建设上来,以农业的大规模增产更好地支援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开始思考探索一条以中国自身实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指明农业发展远景的现实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区积极推行以劳动互助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的推进,“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①。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转批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是中国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

收稿日期:2023-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KS020)

作者简介:林晨(1996—),女,江西上饶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4 页。

的形式,要求“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①。1953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心由互助组转向发展和巩固初级合作社。一时间,全国农村掀起了建设初级社的浪潮,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1955 年初,受自然灾害和粮食多征多购等因素影响,农村部分地区出现卖耕畜、滥宰耕畜等现象。对于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的不安,党中央在 1955 年 1 月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合作社发展按照“停、缩、发”三字方针进入了控制发展和着重巩固的阶段。

1955 年 4 月,毛泽东前往南方视察,他沿途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不一样的材料,由此引发了他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态度转变,农业合作化决策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折。1955 年 7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在合作化运动中像个“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倾向。在毛泽东看来,现在“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造成“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②的被动局面。1955 年 10 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改之前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停、缩、发”的思路,农业合作化潮流勇往直前,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一再地超过以往任何乐观的估计。仅在 1955 年下半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就由 1 690 万户增加到 7 000 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例就由 14% 增加到 60% 以上,有些省、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合作化基础较好的地区,初级社升高级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已经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③。至 1955 年底,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基本完成。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使得毛泽东感到“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

化”^④。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组织起来”的农民有更大的潜力加快农业生产、快速提高粮食产量,为了适应接下来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态势,“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⑤,或者哪怕是只提出一个粗线条的规划,也必须拿出来^⑥。1955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再度南下。他在同十五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交流讨论后,形成了《纲要》最初的文本形态“农业十五条”和“农业十七条”。1956 年 1 月毛泽东回到杭州,他结合自身调研成果再一次扩大了讨论范围,将十七条意见内容扩展为四十条。1956 年 1 月,以四十条为主要内容的《纲要》草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对于制定这样一个四十条的目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社会工作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⑦客观来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进程虽然在后期有过急过快的问题,但在农业生产关系调整任务完成后,适时地将农民的改造热情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却恰逢其时。

(二) 集中规划农业生产以解决工业化建设的供需矛盾

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考虑制定一个专门适用于农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不仅是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从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农副产品大量需要的现实矛盾出发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积贫积弱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需要一个能够实现规模增产的农业经济体系提供亟需的原料来源、资金支持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1953 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施行后,农村经济进一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轨道。但是,土地改革后在小块土地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增产依旧有限,而工业生产中对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部分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1 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59 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3 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6 页。

^⑤《毛泽东传(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68 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7 页。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6 页。

需求却与日俱增,工农业之间紧张的供需矛盾随之而生。“工业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使农业显得捉襟见肘,在1953年、1955年和1957年发生了三次粮食短缺的现象。”^①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已经严重桎梏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②如果我们不能在农业领域来一个大规模增产,“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③。可见,农业大规模增产已成为确保大规模工业建设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紧张的供需矛盾,给工业化建设提供稳定、大量的商品粮及工业原料,毛泽东在1955年11月的南下视察中,围绕农业增产问题同地方负责同志进行了充分交流。毛泽东考虑通过制定一个统一、专门的农业发展计划,“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④。在此次南方调研途中形成的“农业十五条”“农业十七条”,就初步规定了我国粮食产量1万亿斤的增产目标。这也奠定了《纲要》鲜明的增产导向。之后,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形成的《纲要》修正草案也提出在十二年内粮食增产“四、五、八线”和棉花增产的“三、四梯队”的增产指标。可见,毛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综合运用各种增产措施,使我国农业按照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实现快速增产。

(三)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觉

独立自主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将完成、大规模建设即将开启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基于农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优先从农业入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农业不仅关系到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综合考量国内外现实因素决定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将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投入重工业领域。“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增大。1953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为46.9%,其中重工业占比17.5%;至1957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6.7%,重工业比重随之增加到25.5%^⑤。重工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对一定时期内我国工业化起步和国民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从而造成了农产品和主要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等问题。随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不断丰富,毛泽东意识到:“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⑥为了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重大关系,毛泽东希望通过制定一个适用于农业的专门规划以提高全党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加强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领导,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

另外,毛泽东领导制定《纲要》也是考虑到农村稳定和农民增收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工业化建设顺利开展的意义所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村的繁荣稳定对于巩固工农联盟、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村地区稳定离不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毛泽东将五亿农民纳入一个横跨国家三个五年计划的十二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实际是进一步将农民增收问题同国家工业化建设问题联系起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不仅能使农民摆脱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还能“使农民有比较现在

①席富群:《艰难的起步: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4—715页。

⑤《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①，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国内市场和资金、原料来源，以尽可能快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目标。

二 《纲要》凝结着毛泽东探索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思考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视为一个集农业增产、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的系统目标。《纲要》初步回答了十二年内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方向、原则、目标及发展路径等重要问题，为党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作出了有益思考。

(一) 中国农村必须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发展的道路决定了亿万农民的命运。《纲要》首先规定了中国农业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这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和农村共同繁荣的根本性前提。土地改革后，亿万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高涨。农村经济恢复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带来了农村阶层的新变化。1953 年山西省委报送的关于农村出现新的自发势力和新的土地兼并问题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 1955 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②

为了进一步遏制这种现象，《纲要》将农村两极分化问题上升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并指出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是把农民的命运交付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结果只能带来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如果不及时遏制这种新的分化现象“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③。同时，《纲要》通过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关系作出前瞻性规定以及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不断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进而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根基。

(二) 实现规模增产和多种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在合作化基础上实现农业大规模增产是《纲要》的首要目标。当时，工农业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不够，这就是棉花、麻、油料、烟叶、甘蔗等等原料增长的数量暂时还将低于工业生产增长的要求”^④。针对这一需要，《纲要》向亿万农民提出了以粮、棉、油为核心的系列增产指标。1956 年通过的《纲要》草案版本首次公开规定了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产的“四、五、八线”^⑤以及棉花(皮棉)每亩年均增产“三、四梯队”^⑥的增产指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对原有的粮、棉增产指标进行了再次提高，并新增了关于花生、大豆、油菜籽等油料作物产量的增产指标^⑦。至此，一个以粮、棉、油为主要内容的全线增产计划指标就此形成。虽然这些指标大多都受到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而过高，但是增产指标的提出也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合作社经济也进一步纳入了计划经济轨道，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突出贡献。

此外，《纲要》还要求各地在确保粮食增产保供的前提下，依照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实

^①《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3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7 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4 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6 页。

^⑤“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 页。

^⑥“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 1955 年的 35 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 60 斤、80 斤和 100 斤。”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 页。

^⑦“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一倍到两倍。花生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三百斤至五百斤；大豆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二百斤至四百斤；油菜籽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一百斤至三百斤。”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28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6 页。

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国国土面积辽阔、气候地形多样。《纲要》基于我国自然地理特点,分别对牧区畜牧业、山区药材生产、林区林木种植、临海临湖临江地区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业等作出了专门且细致的规划。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发展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健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门类,也有利于满足人民对农副产品的多样化需要。

(三)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曾一度主张效仿苏联,走一条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农业发展道路。而毛泽东综合考量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推广农业机械化现实条件等问题,认为“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①。《纲要》进一步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纲要》开篇第一条就对推进合作化、巩固合作化制度的领导力量、阶级依靠力量和发展原则作出了规定。为了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纲要》要求各级农村工作部必须对合作化事业加强领导、积极推进、不能放任自流。巩固和领导合作社主要依靠的阶级力量是贫雇农和中下农(主要是入社前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以及部分适当的中上农代表。并且强调,农户入社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通过彰显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方面的优越性,鼓励和争取个体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到1957年底,全国农村的高级社达75.3万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达到96%以上^②。以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高级社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优先实现合作化不仅为确保我国农村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生产关系规定,也为农业实行大规模机械作业提供了前提。在毛泽东看来,以家庭为单位、在小块土地上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同农业增产及机械化作业是矛盾的。实现农业合作化,就是要引导亿万农民通过土地入股、集体

劳动等形式加入合作社,从而把数千年延续下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为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能够进行规模生产的集体经济。“合作起来,土地连片,去掉田塍地界和多余的田间道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积”,“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壤”^③。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为生产关系前提,只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继续做文章,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解决束缚农业规模作业的生产关系阻碍后,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技术革命在农业现代化事业中的突出作用。围绕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目标,《纲要》在第四至第十六条,以较长的篇幅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进行重点部署。提出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大背景下,将全国工业发展串联起来,走一条从改良农具到半机械化(使用新式畜力农具),再到机械化(使用动力和机引农具)循序渐进的工农联合的发展之路。在《纲要》的指导和号召下,我国广泛开展了群众性农具改良运动,过去单纯依靠旧式农具从事生产的落后生产形态得到初步改变。

(四)兴修水利、精耕细作是农业增产的有效举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④《纲要》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视为实现农业增产的关键。在毛泽东看来,“组织起来”的农民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⑤。《纲要》草案版本由此提出了“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⑥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纲要》依照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将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小河治理工作基本交由农村合作社负责。亿万农民在《纲要》号召下,将治水和生产相结合,农闲时大干、农忙时小干,兴建一切小型水利工程,开展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以配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和大中河流治理。新中国迎来了又一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农田水利工

^①《毛泽东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9页。

^②朱荣,郑重,张林池,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程服务农业发展的能力得到提高。

“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①《纲要》提出：“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②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农民先进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他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按语并吸纳其中宝贵的增产和办社经验进入《纲要》文本，形成了数十条具体的实用增产举措：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增加肥料；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消灭虫害和病害；开垦荒地；合理利用土地；等等。1958 年颁布的“农业八字宪法”，更是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对农业实用增产手段作出更精炼的概括，为帮助推广和普及实用农业增产技术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纲要》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导、组织和干部队伍作出要求，还集中概括了编印增产经验图书、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试验田、奖励丰产模范等可行的增产经验推广方法。这些举措为新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来自组织架构、技术人才、推广经验等多方面的准备。

（五）重视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和教育问题

《纲要》以服务农业生产为导向，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设施作了初步规定。《纲要》第二十三条提出，在十二年内打通省、市、专区、县、区、乡之间的联系要道，基本建成贯通全国的地方道路网，以便利群众出行、发展农村商业网、畅通城乡贸易往来。在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方面，《纲要》第三十条要求，合作社要按照适用、卫生、安全、经济、美观的原则，有准备、有计划、分批开展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工作，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纲要》也提出了在七到十二年内基本普及农村邮政网、电话网等内容。这些建设举措以服务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增产为基本导向，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畅通城乡工农业交流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合作社生产管理体制下，积极开展农村扫盲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农民问题。他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

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③《纲要》提出了在农村普及基础教育的目标，要求合作社综合运用各种办学方式在十二年内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基本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同时，《纲要》也鼓励农村青年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学习掌握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逐步成长为农村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突击力量。按照这一设想发展下去，我国农民将取得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

三 《纲要》在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意义

《纲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原则、路径等问题的初步回答，擘画了十二年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纲要》是党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一般而言，学界普遍将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作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从《纲要》的诞生过程、制定主体、主要内容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来看，《纲要》的制定与施行标志着毛泽东在 1955 年底就已经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纲要》作为新中国首个适用于农业的专门型规划，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擘画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具有较高的历史首创价值。

一方面，《纲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首次尝试。《纲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一，就制定主体来看，《纲要》制定的唯一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同在苏联专家“手把手”帮助和指导下制定、带有深刻苏联发展模式印记的“一五”计划相比，《纲要》从酝酿、形成到两次修改，再到讨论与通过，整个过程都是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探索的结果。其二，就文本内容而言，《纲要》作为一个专门适用于农业发展的专门型规划，既包含明确的规划

^①《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7 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1 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5 页。

时间和发展目标,也从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教育农民三个方面出发,为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路径规划,是一个具有较高完整度和较强指导性的行动纲领。其三,就在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史中的地位而言,《纲要》是我们党农村工作的重心由改造转向建设的标志,也是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这一规划文本中包含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方向、原则、内涵、路径等重大问题的首次系统回答,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

另一方面,《纲要》的出台与实施是毛泽东在农业领域反思与纠正苏联模式弊端的一次实践。苏联模式在发展中暴露出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积累消费比例悬殊等问题。“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①《纲要》的出台进一步凸显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我国在内生积累的过程中“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②。这为党在新时期进一步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实现“四化”同步,进而探索一条工农并举、工农互助、城乡互援、协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预先指引。

(二)《纲要》的实施为新中国农业现代化事业奠定实践基础

《纲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规划内容的施行也深刻改变了农村与农民原有的面貌。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时代施行乡村振兴战略,都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事业所奠定的发展基础。

《纲要》带来的农业增产高潮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纲要》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全国五亿多农民和千百万农村工作者极高的生产建设热情。依照《纲要》中规定的农业增产指标和重点发展方向,广大农民综合运用改进品种、扩大耕地、提高复种指数等综合措施,大大提高

了粮食产量。1955年至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逐年上升,从1955年的18 394.6万吨,上升到1956年的19 275.6万吨,到1958年达19 766.3万吨^③。粮食大规模增产保障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储备、粮食分配等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和必要的资金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农业合作化这场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不仅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④。

同时,《纲要》的施行带来了我国农田水利事业新的建设高潮。过去,我国农业长期遭遇水旱灾害的影响,农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不足,靠天吃饭的情况十分普遍。我国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也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稳定增产的桎梏。为了尽可能消除水旱灾害对农业的损害,《纲要》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作为实现农业增产的首要措施,提出了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除水旱灾害的宏伟目标。《纲要》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再度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广泛开展了大规模的打井、开渠、挖塘、筑坝运动。仅1956年一年全国水利基本建设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大,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建设工作量。在1957年至1959年,我国排灌机械马力从56.4万马力快速提升到300万马力、农田灌溉面积由5.2亿亩跃升至10.7亿亩^⑤。“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抗御自然灾害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可比拟的磅礴力量,办成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不敢想、不敢办、办不了的大事。这一时期,全国普遍开展了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为当时农业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今后农业发展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

《纲要》对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规划与实践,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资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

^⑤农业部农田水利局:《十年来农田水利建设成就1949—1959》,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扉页插图。

体系从无到有的巨大跨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事关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的重要事业。近代中国,由于连年战乱频仍,农民不仅要承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村中疫病横行、缺医少药的情况更是常见,对弱势群体施以社会保障的关怀更不具备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困扰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危传染性疾病,《纲要》提出了在农村广泛开展消灭高危传染性疾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搞乡村绿化的举措。鼠疫、天花、黑热病等传染性疾病基本上被消灭,农民生命健康得到了保障。尤其是后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①,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下沉。至 1965 年,“在农村,以‘有医有药’为首要目标,初步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医疗卫生保健网”,“全国城乡医疗卫生网已基本形成”^②。此外,《纲要》针对社内鳏寡孤独的社员提出的“五保”关照措施,同之后的大办农村合作医疗一道,共同构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③,农村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再者,《纲要》的实施使农村基本设施建设获得起步,许多地方原有交通闭塞的落后局面有了初步改变。农村扫盲工作也获得快速发展,部分农业人口经过科学文化的武装和政治思想教育,初步达到知识化水平。

(三)《纲要》为党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探索是一以贯之的。《纲要》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坚持《纲要》中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的发展实际提出新思想新理论,为新时期推动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

保障粮食供应、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农”工作的首要目标。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纲要》提出的以粮为纲、规模经营的思路基础上,接续提出“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

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⑤。1984 年,我国粮食和棉花由长期供不应求首次转变为供过于求,粮食安全得到初步保障。在稳定粮食生产后,2007 年的中央 1 号文件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动我国“三农”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农业依照农林牧副渔、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展开。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在“星火”“燎原”“丰收”等重大科技开发计划的推动下得以较快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过百分之六十五,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五十七”^⑥,部分地区还率先推行“互联网+农机作业”。这都离不开《纲要》为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提供的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技术储备。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培育现代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纲要》开篇序言就指出了,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是一条持续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时期,党继续贯彻富农惠农强农方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制度创新不断释放农村生产力,为农民增收提供制度供给,又持续通过“三西”专项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等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工程,成功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千年难题。同时,党在新时期将教育作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成为防止贫困代际相传、帮助农民摆脱贫穷的关键之举。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趋向。受到现实生产力水平限制以及国家农业支援农业基本格局的影响,《纲要》提出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服务农业生产为首要导向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不全、基本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06 页。

^②齐鹏飞,杨凤城:《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09—310 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5 页。

^④肖贵清,梁庆朝:《〈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76 页。

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不足客观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继续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不断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多样化、更高层次需要,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加快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低保、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兜底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下大力气推动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初步建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继续坚持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我国农

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①,推动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结语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纲要》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凝结着毛泽东改变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景。尽管《纲要》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躁冒进的错误、提出的绝大多数指标也都脱离实际而未能完成。但是,《纲要》的出台顺应了当时工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我国农业战线上的又一次增产建设高潮,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New China: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utline from 1956 to 1967*

LIN Che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At the end of 1955, as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was accelerating, in order to better guid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the struggle of millions of farmers, Mao Zedong took into account China's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ormulated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utline from 1956 to 1967*, a special plan to guid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plan reflects Mao Zedong's concentrated thinking and practical summary on major issues, such as sociali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farmer progress in China. It is a great attempt for the Party to independently explore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New China.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have provid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Part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uccessfully opened up the path of socialist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utline from 1956 to 1967*;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deology

(责任编辑 朱春花)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